

冷酷

尼林著



44

冷

酷

[苏] 尼林 著

肇 堃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Павел Нилин

Жестокость

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7 年新版本译出

冷

酷

原著者 [苏]尼

林

翻译者 肇

敏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毫米1/32 印张：8 1/4 插页：1 字数：183,000

1961年11月第1版

1961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78·1823

定价：(九)0.88元



作者象

我所記得的烏澤尔科夫，就是我們在值班室里，頭一回見到他的那個模樣。

身材矮小，骨瘦如柴，戴一頂灰色的兔皮帽子，穿一件斑斑点点的狗皮大衣，胳膊窩里夾着個帆布公事包，那天中午，他突然到刑事偵緝局找我們來了。進了門，摸出來一張省報特派記者的採訪証，也沒有說什麼懇求的話，劈口就向我們索取有趣味的新聞資料。他就是這麼說：要點有趣味的資料。

我們提供給他的幾個地方案件，都不中他的意。

“這種盜竊案子，算得了什麼！請你們給我點那種……”

他嗒的啞了一下舌頭，意思要我們一下子就明白，他要的是哪一種新聞。

當時我以為，他一定有興趣了解一些關於騙子手、翻戲黨之類的資料，我就當場從櫥里拿出一本照相簿來。不料他連一眼都不看，滿不在乎地說：

“我不是契查爾·朗勃羅左^①。對於人的相貌，我絕對不感興趣。”

說着有點滑稽地動了動耳朵。

① 契查爾·朗勃羅左，十九世紀末意大利精神病學家及犯罪學家，主張一種反動學說，認為凡是“犯罪的人”，相貌上都具有某種生理特徵。

应当交代一下，他的耳朵生得很大，往外張着，俗話所謂“招風耳朵”的便是。而且後來我們發覺，每逢他激動或者生氣的時候，他這對耳朵還會自然而然地翕動。這麼一對耳朵，長在他那鳥一般的尖腦袋上，再配上個肉嘟嘟的鼻子，好像是碰巧雜湊起來的。

這種鼻子，長在一個思想家或者一位軍事統帥的臉上，原很可以生色不少。偏偏對於烏澤爾科夫，却反而有損體面。大概烏澤爾科夫對這一點也有自知之明。他大概也能感到，他的鼻子、耳朵，以及整個猥瑣的身形，都會惹人發笑，或者引起人們一種譏諷的心情。因此他在人們面前，也總是極力表示出他對別人的嘲笑態度。

我很早就發現一個真理：大凡在舉止上過分的裝模作態，或者無端地裝得氣勢汹汹、咄咄逼人的，往往就是一些抱恨自身有缺陷的人們。

不過，烏澤爾科夫是否就屬於這一類的人，那我可就不敢武斷了。

同時，我也不想在他的形象上加以誇張，免得有人以為，事隔多年，現在我存心要和他算那私人的舊帳。不，我只是想盡我所能，把當初之事恰如其份地描述出來。至於說，我拿烏澤爾科夫這個人物，拿他到我們值班室的這一天來當這故事的開場，那也不過是因為，我所要敘述的主要事情，正好發生在他到來之後罷了。

雖然，在第一天，當然誰也料不到有什麼事的。

烏澤爾科夫神經質地聳着肩膀，在我們值班室里來回踱着，一面把塊手巾托在兩個手掌里，唏哩嘩啦地擤着鼻涕，他說：

“請你們給我點那種基本的素材。其餘的我自己來發揮。

我想今天就赶好它一篇不同凡响的文章，在星期天见报。一篇别开生面的东西……”

“要不要我理一点巫师的材料给您？”柯里亞·索洛維耶夫說。“那些巫师在这儿害人太甚。应当在报纸上揭露他们，好好地批评一下……”

“巫师的文章我在庫洛明斯克县已经写过了，”烏澤尔科夫說道。“况且这种题材，老实說也不合我的风格。不瞒你說，我不是什么工人通訊員，农村通訊員，我是不批评人的。我是要拿一些特殊重大的事件，来加以闡明。这就是我此番来的目的……”

“噢，”凡卡·馬雷舍夫捉摸到了他的意思。“我知道您要什么了。我就去拿来……”

这位省报代表，初次光临此地，我們自然都乐于巴結他。因为杜达利这个县城，誠然象旧的旅行指南上所說，环山抱水，风景如画，可是西伯利亞的道路錯綜，交通不便，游客毕竟不容易到这里来。

从省中心到杜达利，要乘輪船，或者乘火車再換馬車走驛道——一般至少要有五天路程。

路途这样遙远，再加大家知道，路上随时有遭匪徒襲击的危险，所以，要沒有非常的必要，是不大会有人敢走这一程路的。

在二十年代的头几年里，这些地方还是有很多土匪。

土匪当中甚至还有將軍——白軍的將軍，在內战中被完全击潰的亡命者。

不过，在杜达利县的几伙匪帮里，已經沒有將軍和上校这等人了。他們已被現在开向太平洋沿岸的国家統一政治保卫局的特別部队猛烈地打乱了。

經過了几次大規模的清剿以后，如今在杜达利周圍出沒的，只是几个力量已被削弱的匪幫。然而他們还没有削弱到足以讓我們在汇报中写上“昨夜平靜无事”。不，杜达利县内还没有平靜之夜。連平靜之日也不常有。

杜达利四周的叢林里，匪徒还是成群結队，到处流竄。他們杀害村子里的积极分子，襲击合作社，攔劫大路行人。他們极力利用每一个机会，煽动居民对新政权不滿，在农民中間制造混乱，并趁此为他們伙里搜罗更多的爪牙。在郊外大路上行走，确是非常危險。

因此，只要有人敢冒險到这儿来，就多少算得上个好汉。我們对待外地来的人，一向很殷勤。而这位特派記者，自然会受到格外殷勤的招待。

固然，他此番来到我們这里，似乎正巧在暫时的风平浪靜时期。

这时是冬天。在那些最橫蛮的匪首当中，有个大名鼎鼎的柯斯佳·伏龙卓夫，是个富农的儿子，以前高尔察克部下的中尉，自封“綠林皇”；連他这样一个橫行无忌的土匪头子，在冬天，也把他的喽罗帶进了林中深处，潜伏在雪堆里，暂时停止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守到来春再出来行事。

在春天和夏天，在那些被风刮坏的树木中的密草堆里，別說人的足迹，連馬脚印也看不出来；可是他要在冬天活动，那就危險多了。

还有茲罗特尼科夫、克罗奇科夫、維克戈戈諾夫等几个匪幫，到了冬天，也撤到了离城鎮稍远的地方去。

在这冬天时候，城市里多半只有小部份的散匪还在滋扰，再有便是那些小偷、扒手、惡棍、騙子手、劫路盜之类的歹徒。

冬季里，我們的工作也不輕，可是比春夏兩季究竟輕鬆多了。

我們總是在冬季準備春季的事，布置新的諜報網，并抽空編寫一些最突出的事件的詳細記錄；我們的局長，說話喜歡咬文嚼字，照他的話來說，這種突出的事件，是對於刑法科學能夠代表一定利益的。

凡亞明·馬雷舍夫，作為機密行動部的局長助手，想的原也不錯，他想這位記者一定有興趣看看這種記錄。馬雷舍夫把兩本滿是照片和圖表的日誌抄本拿來，擺在他面前。不料那傢伙連翻也不翻，他哼哼鼻子，冷笑一聲說：

“請你注意啊，我不是歷史學家。你還是想辦法給我點那種新鮮一點的，那種……”

說着他又嗒的啞了下舌頭。

他這種啞舌頭的玩意兒，我們開頭就不喜歡。可是第一回我們沒說話。第二次，凡卡·馬雷舍夫就說了：

“喂，怎麼，您以為這兒每天都有殺人的事嗎？照您看來，我們這些人是在這兒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你們在這兒幹什麼，”特派記者又冷笑一聲，鼻子一哼。“可是我親自到此地來，就為的是用藝術的形式，來闡明一些最最新鮮的、而且是尽可能耐人尋味的事件。抱歉，我必須首先關心到讀者。讀者等着要看的，主要就是新鮮事件嘛……”

這些話我們也不喜歡。

這位記者，年紀看來不比我們大——十七歲光景，頂多十九歲。這一點我們也特別覺得惱恨。他充什麼大亨呢？

他穿著那件狗皮大衣，戴着兔皮帽，擺出一副一切都不在話下的神氣，把那只帆布公事包象煞有介事地開了又關，關了又

开，弄得我们在第一天，甚至不敢断定他是什么身份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又是嫌这不好嫌那不对的，把汇报乱翻一通，不满意地皱着眉头，一面在笔记本上记下一些什么，要不就口咬铅笔，轻声叹气。他的叹气声里似乎带有一种郁积多年的忧伤。这种伤感之情，也反映在他那对圆滚滚的乌鸦眼中，眼眶里间或还淌出点眼泪，也不知是因为寒气呢，还是光线刺眼呢，或者别有其他原因。

有几件案子毕竟中了他的意。这时，他就心满意足的，从公事包里摸出十来支用报纸卷成的烟卷儿，请我们大家抽。

连那坐在值班室里等候自己命运的小偷，也分享到一支。

后来，他跟我们聊了半个钟头，附带作了个声明，说他虽然姓烏澤尔科夫，大家只叫他雅科夫，可是在报纸上却用的是“雅庫兹”^①笔名。他不知为什么问起我们是不是党员，而且从此以后，差不多天天都到刑事偵緝局来找我们了。

我们局里，订有严格的规则。譬如有一条规定，对待任何人都必须特别和气，不管他是小偷也好，见证人也好。可是尽管这些规则从未遭到破坏，来的人在机关里，总免不了有点胆寒。这在我们看来也是自然的事。我不妨多说几句。我们自己也有点怕这个机关，因为在这里，谁也不能指望得到什么宽容。犯错误，越权，破坏法纪——都要请你尝铁窗风味。

我们的局长以前是马戏团演员，在内战中失去了两根肋骨、左手的三个指头，由于偶然的机缘，来到了西伯利亚。他极其安静，一有机会，就经常重复这样的话：

“政权要求我们什么呢？政权要求我们随时用心。我们是

① “雅庫兹”，是名和姓的开头几个字母（即“雅科”和“烏澤”）拼成的。

在什么場所工作呢？我們是在机关里工作。是什么样的机关呢？苏維埃政权的机关。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一切都应当井井有条……”

他还对我们說：

“你們要注意，愚蠢——是世界上最浪費的东西。你們都不妨自己思索一下，我为什么要这样說。我没法把一切东西都裝进你們的腦袋。每一个人都应当自己思考。所以必須要靜。”說着从那副玳瑁眼鏡的上边，留神而又严峻地把我們一打量，問道：“大家都明白了唄？”

我們机关的干部，多数是年青人。久經风浪、生活經驗丰富的局長，就象老师一样苦口婆心地教育我們，他把这看作自己的終身責任。

他認為愚蠢是最不可赦的罪惡，拿它的可怕后果告誡我們。他不惜用亲身的慘痛事例來作証，断定他的肋骨和手指，就是由于愚蠢而在戰爭中失去的。

“那时候我太匆忙了。想做得比大家聪明。其实这一点也不需要。任何事情都应当有它的秩序。”

他認為，有秩序的主要特征——再說一遍——就是靜。因此，那条一直通到局長办公室門口的幽暗狹長的走廊，总是靜得异乎寻常。局長办公室在屋子的最里面，一个寬敞的房間隔成兩間——一間会客，一間办公。

走廊里鋪着厚厚的地毯，听不見脚步声，我們自己走在這條走廊里，也总是怯生生的，对我们局長崇高的人格，和我们自己这个非同小可的事业怀着一种肅然起敬的心情。

可是这位雅庫茲，或者說雅科夫·烏澤尔科夫，却絲毫不显得胆寒。他走进刑偵局就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在办公室挂

衣处把狗皮大衣一脱，往衣钩上一挂，响得出奇地先擦上半年鼻涕，然后，手挟公事包，头顶兔皮帽，第一件事就是到生着炉子的值班室里去。

在走廊里那张绿色的、有铁弯脚的花园长凳上，每天早晨总有一些人坐着，愁眉苦脸的，象牙医候诊室里的病人一般，这便是些等候传询的见证人和小偷。

乌泽尔科夫在炉子边烤了一会火之后，就到走廊里来，找那些小偷和见证人，大谈其天。我们的规则是严禁和这些人闲谈的。可是在乌泽尔科夫眼里，我们的规则又算得了什么！他说，省刑侦局他是常去的，那儿规模比我们大，规则倒简单多啦。

他总是喜欢强调，说他什么人都够得着，他时常随口提起省局里一些干部的名字，象茹尔啊，伏罗具奇克啊，这些人我们从未见过面，但都是久闻大名了。他甚至还暗示他跟他们很有交情，可是这一点我们却说什么也不能相信。正确一点说，是不愿意相信。

不过，乌泽尔科夫也并没有一定要使我们相信。他跟我们谈话，一贯满不在乎，带着些讽刺的意味。而且在讲话时，眼睛总是望着旁边的什么地方。

有一回，他在值班室里看见一个胖胖的粮食贩子，因为有偷窃嫌疑被拘留的，他忽然若有所思地说：

“这个红脸大汉，使我蓦然想起了高康大。”

我问道：

“高康大是谁呀？”

“你不知道？”他表示很惊讶，接着装假地叹着气说：“可你又怎能知道呵……弗朗索亚·拉伯雷^①写过这么一部书……”

那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弗朗索亚·拉伯雷是个何许人。又

不便就向雅科夫·烏澤尔科夫請問。可是他却越来越頻繁地，拿他的文化程度来压我們了。

有时候他来得太早，汇报还在打字机上沒打好，凡卡·馬雷舍夫就亲自給他找材料。

凡卡从本县值班員那儿拿来一本厚得象聖經的本子，对烏澤尔科夫說：

“好吧，你写。‘昨晚九时左右，有武裝匪徒一伙，計八人，在逃避追剿时，襲击維賽拉亞·波多尔維哈村消費合作社……’”

烏澤尔科夫神經質地聳着肩膀。

“用不着你給我口述。我不是小学生。你只要把要点告訴我。我自己会記。”

凡卡就把要点告訴他。烏澤尔科夫記得非常之快。照我們看来，那真正的要点，恐怕他正好沒来得及記上呢。

后来，事实不止一次地証明，我們的担心並沒有落空。記錄簿上一件平平常常的事，一到报上，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不知所云何事了。

烏澤尔科夫在报上的那篇文章，大致是这样写的：“半夜里，消費合作社的門警驀地听得一陣可疑的响聲。夜是霧沉沉的，天空弥漫着烏云，就在这暗空的黑絲絨背景上，黑影幢幢地出現几个騎馬的人……”

我不想隱瞞——当时我很喜欢雅庫茲的写法。喜欢他的文句。可是他写的是假話，我很不痛快。既沒有騎馬的人，也沒有烏云。徒步的匪徒是有的，門警也有，可是他那时睡着了。

① 弗朗索亞·拉伯雷，是十六世紀法國諷刺文學大家；高康大是他的名著之一。

凡卡·馬雷舍夫、柯里亞·索洛維耶夫、還有別的几个弟兄，也都在生烏澤尔科夫的气。可是他仍旧若无其事。他还是照样地来要新鮮材料。而且不久他就要大交好运了。

2

昨晚刮起的一場大風雪，來勢凶猛，到今天還沒停。晌午時分，警長謝苗·伏洛別耶夫在狂風暴雪中趕了來，他渾身披着雪，向我們報告一個消息：

“克羅奇科夫匪幫打林子里到大路上來啦。”

誰也料不到冬天會有這種事情。

昨晚，在布耶尔和列維亞加之間的馬列伐亞新基地附近，烏士利克大道分岔的地方，匪幫布下埋伏，殺了三個合作社辦事員，把几輛農民的運貨馬車搶劫一空。儘管風猛雪大，他們還是往前進——直逼金谷。

“我當場就趕到你們這兒來了，”伏洛別耶夫警長報告說，一面拿只大木梳安詳地梳着濕淋淋的頭髮。“立刻就動身的。”

“先前你在哪兒呢？”我們的局長緊鎖雙眉，睜了伏洛別耶夫一眼，仿佛想用他那寬額角、灰色硬髮剪成“長額髮式”的腦袋撞過去一般。

“先前我在哪兒？”伏洛別耶夫反問了一句，一面望着局長辦公室牆上的鏡子。“哎，什麼哪兒？還不是照常辦事，在自己一區里巡查。這一個區呀，也真夠噲！報告員說，這一區容得下兩個……兩個瑞士呢。而且處處都有歹人，不是土匪，就是私酒商。可整個區只我一個人。再說，我又不是個三頭六臂……”

“全明白了，”局長肯定說，一面把眼鏡架塞入耳后。他已經

不在听伏洛别耶夫說話，把挂在牆上的行动地图取了下来。“这意味着，克罗奇科夫是想利用这场大风雪：他以为风雪会把脚印都淹没的。可这才是愚蠢……喂，馬雷舍夫……四十分钟以后我在这儿，”他拿手指在地图上一指。“你跟弟兄們必須赶到这儿，”他用手指使劲捺着地图，好象要把它捺进去一般。“沒有我的指示，任何人都不得惊动。从这儿出发，”他把手指移过去。“我要請軍校學員来支援我們。現在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克罗奇科夫逃出金谷。办得到嗎？”

“照我的看法……”

“我不是要問你的看法，”局长打断了凡卡的話。“我是要問，事情办得到嗎？”

“办得到，”凡卡点点头。

“好吧，行动吧！”局长命令說。“千万記住：絕對不准擅自行动！要是匪帮退走，你就沿着他們的退路跟踪。要这样做才正确……”

这场行动，当天傍晚就結束了。

晚上，我到局里去值本县夜班时，从金谷载来了七个被捕的匪徒和八个匪尸。

在那些打死的人中，有匪帮的首領——以前高尔察克部下的上尉叶甫拉姆比·克罗奇科夫，和他的副官祖波克，这个副官只有十五岁，据說在他很小的时候，克罗奇科夫在打内战的路上檢到的。

打死的人就放在刑偵局院子里的雪地上，等待驗明正身。他們躺在那間有鉄格窗的石头披屋旁边，黑暗中活象几根木头。

我提了盞“蝙蝠牌”提灯，到院子里去。

凡卡·馬雷舍夫正在院子里看那些尸体，看了好半天。他肩膀上披着那件大皮襖，头上戴了一頂狐皮里子的蒙古帽，这时的模样很象个守夜人，而且就象守夜的在院子里慢吞吞地踱着步，仿佛覺得腿冷。

我問起他今天这场行动的經過情形。

“混帳，”凡卡說，把头朝尸首那边一摆。“你瞧瞧，我們那个瘋子——約瑟夫·戈魯布奇克干的好事……”

我一向知道凡卡不喜欢戈魯布奇克。可是这会儿我却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生气。我拿提灯照着匪尸，奇怪地問道：

“怎么，这些人难道都是戈魯布奇克打死的？”

“不是，”凡卡說。“克罗奇科夫，喏，就是这个，是柯里亞·索洛維耶夫打死的。这一个，”他微微踢了踢一个尸首，“好象是我打死的。那几个，是軍校學員打死的……”

“那末戈魯布奇克呢？”

凡卡什么也沒有回答我，他弯下腰去看祖波克的尸首。

祖波克躺在雪上，身上是一件漂亮的鑲着灰色羔皮的黑披肩，脚上是一双綉花的毛皮高統靴，沒有帽子，白毛头，头发整齐地朝两边分开。

显然，現在已經丢失的那頂帽子，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終压着他的头发，所以头发还是一点也不乱，贴在他那永远僵硬了的腦袋上。

“你瞧，他这一枪打在他什么地方，”凡卡把那尸首身上的披肩解开。“正好打中心窩，真是畜生！誰要他杀死小孩子的？”

我方才明白，祖波克是戈魯布奇克打死的。可是我不能贊同凡卡的气憤。

“在紧急关头分不清誰該打死，誰該留下，”我說。“你不打

死他們，他們就打死你。”

“胡話，”凡卡接過我手裡的提燈。“祖波克我們管保可以活捉過來。你還記得秋天鋸木廠裡的事嗎？那回在屋頂上，我差不多把他抓住了。連他手裡的短馬槍也打落了。簡直逼得他走投無路。誰也不信他會從兩層樓的屋頂上跳下來。可他連想也不想——就蹦的跳下了。好個大胆的孩子。下面要沒有鋸屑，他非摔個半死不可。可是他一點沒什麼，跑了，當時我在屋頂上看得清清楚楚，看他在院子裡跑過去。就是腿有點兒拐……”

“他跟土匪搞在一起，總歸是完結了，”我希望凡卡不要為這個打死的人難過，就這麼說道。“克羅奇科夫對他當然有很大的影響……”

“克羅奇科夫是個廢料，”凡卡朝克羅奇科夫的屍體啾了一眼。“克羅奇科夫只能把他搞成個土匪，可是我們可以使他變成一個好小伙子。變成一個了不起的小伙子的……”

“我看不見得，”我說。

“你怎麼的，是個傻子嗎？”凡卡忽然好像驚訝起來，望了望我。他還想說些什麼，可是這時約瑟夫·戈魯布奇克正好從屋子裡走到台階上來。

他是個瘦長條子，背有點駝，穿著件短得不配身的短皮襖，短短的袖子，他踏著雪朝我們走來，拿手裡的短馬鞭拍著靴統。

他的背後跟著那位矮小的雅科夫·烏澤爾科夫，敞開著的狗皮大衣活象兩個翅膀，手裡拿著本筆記簿，不知為什麼把鉛筆咬在嘴裡。

“在欣賞嗎？”戈魯布奇克問我們道，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看出他在冷笑。

我們沒吭聲。